

女性与自然的对话

——《浮现》的生态女性主义解读*

吴夏娜

(广西财经学院 外语系, 广西南宁 530003)

[摘要]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小说《浮现》中体现的生态女性主义意识反映了小说作者对女性——自然联系的生态女性主义文艺观。文中女主人公通过两个层面的旅程, 即生理和心理的旅程, 逐步建立生态女性主义意识。通过这一旅程, 女主人公意识到男性对女性和自然的双重压迫和统治以及女性与自然之间的联系, 并力图消除压迫女性和自然的共同根源——男权制等级二元论, 以求建立男性与女性、文化与自然之间平等和谐的关系。

[关键词] 生态女性主义; 自然联系; 男权制等级二元论

[中图分类号] I0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0598(2007)02-0134-04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作品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主题: 民族主义、女性主义和生态主义。作品从民族意识、女性意识和生态意识等层面反映了阿特伍德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更难能可贵的是, 阿特伍德是最早意识到女权运动和环境运动相联系的作家之一。她的生态女性主义文艺观在于1972年发表的小说《浮现》中得以清晰地体现。小说中阿特伍德提出了关于女性和自然等问题的思考: 女性与自然的联系是什么? 是否应该将女性和自然相联系? 对女性和自然造成双重压迫的根源是什么? 女性对自身解放和对自然解放应该负有什么样的责任? 本文将用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的理论和方法分析《浮现》一书中体现的生态女性主义意识。

鉴于生态女性主义是较新发展起来的批评论和方法论, 要更好地理解《浮现》中体现的生态女性主义意识, 首先就要了解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和内涵。早在1962年, 美国生态思想家蕾秋·卡森(Rachel Carson)就在《寂静的春天》一书中抨击了人类对环境造成的破坏。她是最早关心环境问题的女性之一。1974年, 法国学者费朗索·德·埃奥博尼(Francoise d'Eaubonne)首次使用了“生态女性主义”一词, 并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对妇女的压迫和对自然的压迫有着直接的联系, 其中一方的解放不能脱离另一方的解放。大约十年之后, 另一著名生态女性主义者卡林·华伦(Karen Warren)进一步详细阐述了生态女性主义的核心假设, 她指出:“(1)对

妇女的压迫与对自然的压迫有着重要的联系;(2)理解这些联系的本质对于充分理解妇女和自然所遭受的压迫是十分必要的;(3)女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必须包含生态学的视角;(4)生态问题的解决必须包含女性主义的视角”。

根据艾丽尔·莎拉(Ariel Salleh)所下的定义, 生态女性主义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女性主义思潮, 它认为目前全球生态危机是由男权制文化所致”。生态思想和女性主义的结合并不是偶然的——几乎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把女性和自然联系在一起。因此, 在女性主义和生态问题之间存在着概念、象征和语言的联系。在传统的概念里女性被“自然化”, 而自然也被“女性化”了。人们常用一系列动物名称来把女性“自然化”, 这些动物包括“母牛、狐狸、小鸡、蟒蛇、母狗、海狸、老蝙蝠、猫咪、猫、小鸟脑袋、野兔脑袋”。同样, 自然也是被“女性化”的, 当“她”被男性蹂躏、主宰、征服、控制、穿透、开垦和采掘时, 自然也被“女性化”了。而西方思想的主要渊源《圣经》更为人类(主要指男性)征服自然提供了文化依据。上帝造人时, 将征服和控制自然的权利一并交给了男性, “你们要繁衍; 要遍布并控制地球。你们要管理海洋的鱼类, 天空的鸟类和地球上所有的动物”。当自然被征服, 女性也遭到了奴役。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时, 上帝在赋予男性征服自然的权利的同时, 也允许亚当控制和支配他的妻子。

生态主义思想与女性主义思想必然结合的直接动力来自于它

* [收稿日期] 2006-11-03

[作者简介] 吴夏娜(1975-), 女, 广西财经学院外语系, 讲师, 英语语言文学硕士, 主要研究方向: 当代英美文学、加拿大文学。

们攻击的共同目标。在抨击男性对女性和自然压迫的同时,生态女性主义者意识到了两者受压迫的共同根源——男权制等级二元论。生态女性主义者发现,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来,西方世界的文化和哲学理论基本上都是建立在二元对立的基础上,这种二元论把男性与女性、文化与自然、精神与肉体、理智与情感分割并对立起来,并把男性置于女性、文化置于自然之上。生态女性主义者反对把男女割裂开来的二元论,并试图“把建构女性文化作为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尊重差异,倡导多样性,强调人与自然的联系和同一,解构男性/女性,文化/自然,精神/肉体,理智/情感等传统文化中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确立非二元思维方式和非等级观念”。

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生态女性主义得到了蓬勃发展,涌现了一批杰出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家和理论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卡林·华伦(Karen Warren)、罗斯玛丽·雷德福(Rosemary Radford Ruether)、苏珊·格里芬(Susan Griffin)、卡罗琳·麦锡德(Carolyn Merchant)、维尔·蒲卢伍德(Val Plumwood)和旺达娜·席娃(Vandana Shiva)等等。尽管各生态女性主义者在女性—自然联系、女性对自然的责任等方面持有不同意见,但所有的生态女性主义者都赞同罗斯玛丽·雷德福·路德(Rosemary Radford Ruether)的看法,即女性与自然的解放是相互联系的工程。路德认为,“妇女必须看到,在一个继续以支配关系作为基本关系模式的社会,妇女没有自由可言,生态问题也找不到解决的途径。她们必须把妇女运动与生态运动的种种需求联合起来,想像新的前景:积极改造和重新建构基本的社会经济,重建作为这个(现代工业)社会基础的价值观念”。

二

生态女性主义作为女性主义与生态主义的结合对男性在自然界造成的严重破坏表示了极大的同情和关注。在小说《浮现》中,阿特伍德通过女主人公返回故里寻父的旅程揭示了男性破坏环境的恶劣行为。尽管女主人公此行的目的是寻找神秘失踪的父亲,但在旅程中她所经历和所看到的男性侵犯自然的种种行为使她深刻意识到在男权思维模式下自然受控制受压迫的地位。

文章开篇便向读者呈现了一幅满目苍凉的画面。魁北克省北部的树木和湖泊遭到了人类无情的破坏:“湖旁的白桦树正在枯萎,它们染上了从南方蔓延而来的某种树病”(1),白桦树并非遭遇自然的死亡,而是被来自南部的污染弄得奄奄一息。女主人公儿时记忆中的美丽风景现在已被现代文明慢慢摧毁。现代文明的象征之一飞机也已经深入到曾经偏僻的小镇,“我注意到人们也有自己的水上飞机可供出租了”(3)。崇拜征服和控制的男人们以傲慢的态度侵害和摧毁自然环境,正如古希腊哲学家普罗塔哥罗斯所说,“人类(男性)是世界的主宰”。男人们所及之处环境无不经受着惨烈的破坏。他们砍伐树木,建造水库;他们提高水位,破坏湖围;他们炸毁岩石,修建道路;他们残酷冷漠,捕捉动物。随着女主人公深入到魁北克北部的湖区,她对男性破坏自然的意识也慢慢

浮现,“夏日度假的小别墅开始出现,像麻疹一样铺开”(29),“树木不会长得像过去那么高大了,刚刚长成它们就被砍掉。大树有如鲸鱼那样所剩不多了”(47),“许多浸在水里且有些腐烂的树木漂浮在湖面,它们好多是砍伐原木和提高水位时留下来……枯死的松树,浅滩上竖立着砍下的树干的树桩”(30),“湖边的沙地裸露荒凉,沙土一直在流失”(33)。在肆无忌惮砍伐树木和破坏湖区的同时,男人们也残忍地杀戮动物,生态的多样性遭到了严重的威胁。

除了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小说中亦有男性不断残害生命的场景出现。在女主人公回乡的路上,她看到了男人们的杀害动物的行径并以此为乐:“他们急于想看的是油泵旁平台上的三只被剥了皮的驼鹿。它们披着人的衣服,后腿用金属丝支撑固定着。雄驼鹿披着军用雨衣,嘴里叼着一根烟斗,雌驼鹿身穿印花女装,戴了顶花帽。旁边的小雄驼鹿穿着一条短裤和一件条纹运动衫,头上一顶棒球帽,手擎一面美国国旗……一头小雌驼鹿身穿一条有褶边的短裙,头上蓄着一根淡黄色的小辫,一只蹄子撑起一把小红伞”(10)。看到这些驼鹿们被如此残忍无情地杀害并被当作人们娱乐的对象,女主人公一行并没有表现出同情或怜悯,相反的,大卫却表现出了对杀戮者的钦佩之情,并由衷赞叹。男人们君临万物的傲慢心态在小说中时时处处得以体现,他们征服并控制着自然界的一切生物。这种征服者的傲慢在被杀戮的苍鹭中更得以淋漓尽致地展现。被杀戮的苍鹭被人恶作剧一般地吊在树上,“那东西的脚被一根蓝色的尼龙绳缚住,大头朝下地吊在一根树枝上。它的翅膀垂落着张开,被捣碎的眼睛注视着我”(124)。而大卫,小说中男性征服者的代言人,却对苍鹭的惨状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它看上去太棒了。你不得不承认这一点”(125),其对自然界生命的残酷冷漠被揭示到了极致。通过一系列的观察和体验,女主人公慢慢意识到了男性对自然界生物的摧残和破坏,而后逐渐走向觉醒,并为自然的解放而斗争。

三

尽管《浮现》原意是描写女主人公回乡寻父的旅程。但是在这一旅程中,女主人公经历了思想上的巨大变化。她意识到女性在男权社会中受压迫受控制的悲惨地位,并注意到她们受压迫的根源是男权制等级二元论。这一意识通过三个方面得以体现:女主人公父母亲的关系,大卫和安娜的关系以及女主人公与前夫及现任男友的关系。

早在女主人公孩提时代她就从父母亲所扮演的传统角色中模糊感觉到了男女在社会和婚姻中的不同地位,“女主人公父母亲的婚姻在文中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将两性世界区分开来:女性的、直觉、本能的世界和男性的、理性的、科学的世界”。此次重返故乡渐渐唤醒了女主人公年少时的记忆。她回忆起了父亲母亲在社会、在家庭、在婚姻中都承担着泾渭分明的角色。父亲总是理性和理智的,而母亲总是感性和沉默的,“父亲对什么事都做出解释,而母亲知道答案却从不解释”(71)。父母亲分别代表着男性与女性的传统角色:男性总是与理性和头脑联系,而女性总是与情感和身

体联系。在婚姻中,母亲似乎总是以依顺的、沉默的、屈从的形象示人,甚至什么时候、拿什么礼物去拜访朋友都由父亲决定。母亲所能做的就是囿于家庭的范围,操持家务,服侍丈夫和看管孩子。在丈夫的掌控下,母亲有如一个傀儡,头脑简单,思维单一,“(母亲)每年都记一本日记。日记中全是当日的天气和所做的琐事的记述:没有感想,没有感情”(20)。母亲完全遵照着社会赋予女子的要求。婚姻和主妇是她一生的职业,她一直坚守着这一职业直至辞世。

女主人公的朋友大卫和安娜之间的关系同样也揭示出男权社会中男尊女卑的传统。大卫是个电影导演,无论在工作中还是在婚姻中,他都喜欢处于控制的地位,时刻把自己凌驾于女性和自然之上,而安娜则一直处于低眉顺眼、逆来顺受的地位。通过大卫,阿特伍德“揭示了男权制等级二元论中男性对女性的压迫是以女性为代价的”。男性优越的思想使得大卫时时处于控制的地位,他控制着安娜的行动、思想、衣着和食量。在大卫的严格监管下,安娜学会了皈依和顺从,完全丧失了自我,“他不喜欢看到我不化妆的样子”,安娜说(44)。男性破坏和摧残女性就像他们破坏和摧残自然一样,“(安娜)那化过妆的脸倒成了真正的自然的脸了”(44)。婚姻中大卫和安娜从未处于平等的地位,与其说她是妻子还不如说她是性伴侣。大卫对安娜并不忠诚,多次与其他女性有染并在旅途中试图引诱女主人公。对大卫而言,女性不过是身体,任由男性控制和摆布,他甚至叫自己的妻子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裸体拍照。大卫极其反对女权运动,反对女性争取平等。在他的意识里,男性永远是优越的、理性的,女性永远是低等的、顺从的,“我要对家庭主妇讲授怎样打开电视,而同时怎样关闭她们的大脑,这些都是她们感兴趣的”(121)。

男权制等级二元论思想在女主人公的前夫和男友的身上也同样灵验。与其母亲和朋友安娜一样,女主人公在觉醒之前也是处于屈从归顺的地位,并认为“男人应该比女人优越”(120)。返乡的旅程使女主人公慢慢意识到自己在婚姻中所处的被动地位,前夫从来都是处于控制的地位,决定和驾驭着她的一切,结婚、怀孕、流产等尽由他一人掌控,“(孩子)是我丈夫的孩子,是他把它强加给了我,当它在我体内生长时,我总觉得像个孵蛋器。他安排我的饮食,在我身上哺育它。他要一个与他一模一样的复制品。孩子生下来后,我就不在有用”(33)。前夫从女主人公身上所期望的就是“被服务,被取悦”(40),在婚姻中,他始终处于优越的地位。与怀孕时所处的被动地位一样,女主人公发现前夫同样任意处置胎儿,从不考虑她作为母亲的感受,“我必须作出它不曾存在的样子,因为对我来说它不可能存在,它被人从我身边夺走,被带走,被驱逐”(48)。作为女性,女主人公受人控制和摆布的悲惨命运并未随着婚姻的结合而结束,现任男友乔同样处于凌驾女性之上的地位。他从不关心女友及她在第一次婚姻中所受到的彻骨的伤害,并在求婚未果后恼羞成怒。因为这伤害了他作为男性征服者的自尊,对乔来说,女性应该学会屈服和顺从。他把两性关系看成是战斗,

而男性始终应该处于胜利者的位置,“他以为他赢了。他以为他的肉体行为会像一根绳索,一条系狗的皮带紧紧缠在我的脖子上,这样他就能将我带回城市,把我拴在栅栏上,拴在门把手上”(179)。

四

回乡旅程使女主人公深刻意识到了女性和自然一样处于受男性控制和压迫的地位。女性和自然受压迫的命运有着相同的根源—男权制等级二元论。这也是生态女性主义者普遍认同的一点。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和自然传统上和文化上都有着联系,正如卡林·华伦指出,女性和自然之间存在着十种方式上的联系:观念上、实验上、社会经济上、语言学上、象征意义和文学上、精神和宗教上、认识论上、政治上和种族上的联系。激进生态女性主义者玛丽·达利(Mary Daly)也肯定女性和自然之间的联系,但认为女性和自然优于男性,应重建女性与自然世界的密切联系。麦锡特则反对把女性和自然相联系,认为女性既不是自然,自然也不能等同于女性,正如妇女不是“文化的”,她们也不是“自然的”。对于女性和自然之间的联系,阿特伍德并没有直接给出明确的答案,而是通过实验的方法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小说中女主人公通过两个层面的旅程,即生理和心理旅程,意识到了女性和自然的受害者地位。同病相怜的命运使得女主人公抛弃同伴回归自然。重新接近自然使得女主人公由从前无视自然生命的文明人转变成了同情并同化为自然界的一员。小说中女主人公对被杀戮的苍鹭和制成标本的鱼的态度最具有象征意义。当大卫给鱼拍摄用作电影里的标本时,女主人公潜意识里也感觉到了自己在男权社会里也不过是一个标本,“(大卫)要使鱼不朽,他要以自己的方式是其不朽。相册上也有我的位置,我不断出现的身影好似在字典中的花朵被保存起来,被压得平平整整”(71)。在意识到了自己和自然的受害者地位之后,女主人公对被杀戮的苍鹭表现出了同情,“可他们为什么像滥用私刑处死受害者那样把它挂在那儿?为什么他们没有像扔垃圾一样把它扔掉?只是为了证明他们可以这样做,他们有杀戮的权利……但它不能驯养、烹饪或训练其讲话,他们捕猎动物,把它们当作食物和奴仆或陈列它们的遗体,仅仅是这种选择……它们都是战利品”(126)。对男性来说,自然界里的一切存在,其动物和植物,都是处于被征服被控制的地位,就像培根所说的,“自然,跟女人一样,是让男人管理、控制、驾驭、占有、穿透和强暴的”。再一次接近自然使女主人公意识到了男性对待女性和他们对待自然一样残忍,“如果他们不杀死鸟或鱼,他们就会杀死我们。动物死去,而我们就可以存活下来,它们是女人的替身”(126)。为使女性和自然从男权制等级二元论中得到解放,正如华伦所说,“女性对自然界的态度应从傲慢转向仁慈”。

回归自然使得女主人公对自然的态度的变化,由从前被男性同化了的杀戮者的残忍转而变成与自然处于同等地位的仁慈。她把鱼看作整体,把捉到的青蛙放生,认为杀戮苍鹭是错误的。女主人公对自然的同情最终转向完全回归自然,成为自然界里真正的一员。她远离文明,进入丛林深处,吃未煮的食物,甚

至带泥的萝卜,裸体行走,在户外睡眠,与自然界的各种生物为伍,并与之平等相处。

五

然而,女主人公最后发现,与自然平等相处,模糊女性本身与自然生物界的界限对女性和自然的解放毫无帮助,相反的,会使女性和自然更深切地陷入被统治被压迫的地位,“此时此刻,真正的危险来自医院或动物园,当我们不再有能力应付的时候,我们会作为不同的类别和个体被送往那里。他们不会相信这是一个自然的女人,一个自然状态下的女人”(209)。在经历了肌体的饥饿和思想的挣扎之后,女主人公终于意识到要使女性和自然从男权社会的统治思维解放出来,女性既不能被男权社会同化而远离自然,也不能单纯地与自然界的生物完全等同。自然被女性所抛弃,它将完全失去抵御文化压迫的能力。同样的,女性单纯地模糊与自然生物界的界限也使得女性再次陷于被控制被压迫的危险境地。回归决不等于机械地倒退,回归实际上是端正女性与自然之间的联系。阿特伍德认为,在处理女性与自然的联系上,女性必须有一个清醒地认识。这种认识对把妇女与自然从男权社会中解放出来至关重要。她认为,在争取女性和自然的解放中,女性既要保持自己作为人类的文化身份,也要争取女性独立于男性的身份,而不是机械地回归自然。

在与男权制统治和压迫性的二元论的斗争中,女性应该试图打破男性与女性、文化与自然之间的二元对立,在这个长期对立的二元结构中的女性成员仅仅是被消解和同化为男性成员而已。正如蒲卢伍德所说,要克服二元对立,必须承认人类社会的多样性和连贯性,而不是使之断裂成彼此对立的二元世界,必须消除二元制中优劣等级的思维模式,才能建立男性与女性、文化与自然之间的平等关系,建立一种平等和谐的意识,即“人们在地球上诗意地栖居,并尊重和珍惜生态和文化之间的多样性”(11)。正如女主人公在小说中所说的,“我不希望有战争和死亡,我希望不存在这两种东西。我只希望有兔子以及它们多彩的房子,太阳和月亮依次悬挂在平坦的地球上方,夏日总是充满阳光,我希望每个人都快乐”(142)。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在《浮现》中体现了对女性和自然崇高的人文关怀。在关注女性解放的同时,阿特伍德本人对自然的绿色关怀也得以体现:关怀自然生命,也就是关怀女性自己,也就是关怀人类本身。阿特伍德认为男性必须认识到,要在地球上代代繁衍,生生不息,必须抛弃压迫性和统治性的二元对立模式,建立男性与女性、文化与自然之间平等和谐的关系。《浮现》以其深刻的社会、文化和生态内涵,堪称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的里程碑。

[参考文献]

- [1] 陈厚诚、王宁主编. 西方当代批评在中国[M]. 北京: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 449.
- [2] 付俊著.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研究[M].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 1.
- [3] 黄新华编. 圣经故事[M]. 南昌:江西文化音像出版社,1998. 7.
- [4] 罗斯玛丽·帕特男·童著,艾晓明等译. 女性主义思潮导论[M].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365-400.
- [5] Bouson, J. B. *Brutal Choreographies: Oppositional Strategies and Narrative Design in The Novels of Margaret Atwood*[M].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ublishing, 1993.
- [6] Hutcheon, Linda. *The Canadian Postmodern: A Stud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 - Canadian Fiction*[M]. Toronto: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 [7] Merchant, Carolyn. *The Death of Nature: Women, Ecology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M]. Wu, Guosheng, et al, trans.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3: 205.
- [8] Plato. *Protagoras and Memo. Guthrie, W. K. C.*, trans [M]. England: Penguin Books Ltd, 1956:157.
- [9] Warren, Karen J., et al, eds.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From Animal Rights to Radical Ecology*[M]. New Jersey: Prentice - Hall, 1993: 253 - 267.
- [10] *Ecofeminism: Women, Culture, and Nature* [M]. Bloomington: Indiana UP, 1997.
- [11] Zabiniski, Catherine. "Scientific Ecology and The Ecological Feminism: The Potential For Dialogue." *Ecofeminism*[M]. Warren, Karen, ed. Bloomington: Indiana UP, 1997.

(责任编辑:红尘,朱德东)

The dialogue between female and nature

——Analysis of ecological feminism in *Surfacing*

WU Xia - na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 Guangxi College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Guangxi Nanning 530003, China)

Abstract: The ecological feminism consciousness which is embodied in Margaret Atwood's novel *Surfacing* reflects the author's ecological feminism outlook of literature and art which connects female and nature. In this novel, the author uses the heroine's journey on two levels, i. e., physi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journey, to gradually establish ecological feminism consciousness. After the journey, the heroine realizes male's double oppression and control on female and nature and find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female and nature and tries to eliminate male chauvinism ranking dualism, which is the common source to oppress female and nature, in order to establish equal and harmonious relation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and between culture and nature.

Keywords: ecological feminism; nature connection; male chauvinism ranking dualism